

语 义 语 用 修 辞 丛 书

王德春 主编

语言风格学

YUYAN

FENGGE XUE

程祥徽 邓骏捷 张剑桦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

语义·语用·修辞丛书

王德春 主编

语言风格学

程祥徽 邓骏捷 张剑桦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风格学/程祥徽, 邓骏捷, 张剑桦编著.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6

(语义·语用·修辞)

ISBN 7-5435-3036-8

I. 语… II. ①程…②邓…③张… III. 风格学
IV. H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5929 号

•
语义·语用·修辞丛书

语言风格学

程祥徽 邓骏捷 张剑桦 编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电话: 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4.25 印张 129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5435-3036-8/H·84 定价: 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王德春

1997年夏，广西教育出版社几位编辑到上海组稿。在南鹰宾馆，我们共进晚餐，交谈甚洽。他们看到过我写的关于国俗语义、风格、语体、语境、语用修辞、信息修辞等内容的论著，觉得理论新颖、深入浅出，适合于广大读者，建议我在《修辞学探索》、《现代修辞学》、《国俗语义学》等论著的基础上，为他们撰写一套丛书。我很钦佩编辑们有远见，并且思维敏捷、决断迅速。从这项决定中，我看出他们对我研究的学科和研究的情况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并反映出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具有的气魄和业务素养。我虽有点勉为其难，但盛情难却，还是愉快地接受了撰写任务。

这套丛书内容兼顾理论、应用和教学，一共7本。合作者均是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研究的课题与丛书选题吻合，终能顺利完成撰写任务。

我的研究课题，简要表述起来有这几方面：国俗语义研究，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单位的民族文化含义，揭示语言体系本身与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语用研究，是从言语活动中研究话语建构、话语理解和话语本身的规律，揭示言语活动与社会语境、与言语机制的关系；修辞研究，既研究语言体系的修辞手段与方法，又以言语环境为基础，研究话语整体与言语规律，探讨发挥言语功能和提高言语修养的更大的效用。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社会科学研究社会化的问题，特别重视语言学的理论成果要能应用于实践，尤其是应用于教学实践，并进而推广到社会交际活动。我们这套丛书就是根据这一科学、新颖、严谨的研究思路设计的。我与学生合写的书稿以及他们独立撰写的书稿都力求贯彻这一思路，以求丛书内部的协调。当然，后生可畏，后学可嘉，他们将这一研

究风格作了创造性发挥，使丛书内容更为丰富，更为精彩。

语义、语用、修辞的研究，更应该讲究行文的流光溢彩，活泼多姿。因此，丛书的写作，除要求理论的深刻、新颖外，还要求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反观当今讲坛、书市、学术著作的深奥莫测、晦涩难懂已成为传播科学信息的严重障碍。广大读者热切盼望、频频呼唤深入浅出的学术著作，尤其是语言学著作的问世。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无翼而飞者，语言也；修辞使语言飞得更高更远。”语言承载的现代科学信息，飞越高山大海，飞向全世界。但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语言明白晓畅，话语生动活泼，信息传播才会更远。正是修辞，使语言飞得更高更远，使科学深入人心。学术著作要写得深入浅出，语言修辞学著作更应如此。关于这一点，诸位编辑、各位作者与我都深有同感，并达成共识。作者、主编、责任编辑的共同努力，认真工作，终使本丛书力臻完善。

当崭新的丛书一本本地到达读者手中的时候，我作为主编，特别感谢广西教育出版社李人凡先生、孙梅女士等的信任和支持，感谢各位作者的愉快合作，并预先感谢读者拨冗翻阅，不吝赐教。

1999 年暑假

于上海

目 录

序	王德春
第一章 风格学概述	(1)
第一节 风格学的理论基础	(1)
一、一般与个别	(1)
二、静态与动态	(3)
三、特点与风格	(3)
四、语言与言语	(4)
第二节 中国的风格学渊源	(5)
一、孔子的风格观	(6)
二、孟子的风格观	(10)
三、儒家的风格美学标准	(18)
第三节 现代汉语风格学的建立	(19)
第二章 语言风格	(22)
第一节 风格要义	(22)
一、风格的一般含义	(22)
二、风格的语言学术语含义	(23)
三、“特定”与“具体”	(24)
四、风格学研究语言的运用	(28)
五、风格的切分	(33)
第二节 语言风格学的研究对象	(34)
一、语言学对语言结构的研究	(34)
二、语言风格学研究言语的格调	(37)
三、语言的时代色彩	(38)

四、风格形成的要素	(40)
五、语言与言语的转换	(41)
六、语体与文体	(42)
七、语言风格与文学风格	(47)
八、语言风格是一个体系	(51)
第三节 语言风格要素与手段	(52)
一、语言风格要素	(52)
二、语言风格手段	(54)
第三章 语言的功能风格——语体	(57)
第一节 语体的概念	(57)
一、语体的定义	(57)
二、语体领先	(60)
第二节 语体的类型	(62)
一、语体的分类	(62)
二、基本语体	(70)
三、专业语体	(72)
第三节 语体的互动	(75)
一、语体的交错现象	(75)
二、语体的交融现象	(83)
第四章 语言风格学的方法论	(89)
第一节 统计法——感受、理解、描写	(89)
第二节 归纳法——从作品归纳风格特点	(93)
第三节 比较法——从比较看风格系统的一致性	(114)
后记	(128)

第一章 风格学概述

第一节 风格学的理论基础

语言学有许多分支部门，除了研究语言结构成分的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之外，还有研究语言运用的学科，例如修辞学。此外，研究与社会、文化现象相关，以及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的有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等。如果把诸如研究公关用语称做公关语言学，把讨论广告用语叫做广告语言学，那么语言学的分支部门可能会多得不可胜数。语言学究竟有多少门类，没有人做过统计，似乎也无法得出精确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语言学的每一门分支都有它特定的对象、特定的目的、特定的研究方法、特定的理论基础。

一、一般与个别

语言风格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风格学的理论基础是语言与言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学说，风格学本质上是属于言语学的。

语言与言语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同一个民族，使用一种共通的语言（当然还有例外），这种语言，对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都是互相通晓的，因而它具有—般性。—般性，是语言的最重要特点。

一个民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使用这种共通的语言。这种语言用于说便是口头言语，用于书写，便是书面言语。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都

是表露于外的，所以它们合称外部言语。当人们把这种语言用于思考时，它便成为人的内部言语。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的言语表现是完全相同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指纹是相同的一样。言语的表现，人人不同，个个有别，这就生出了“语言风格”的问题。风格属个性范畴，无个性就是无所谓风格。

每个人的语言表现各不相同，这种现象表现在人们运用语言的各个领域。以口头言语来说，有的人说话口若悬河、流利洒脱，有的却钝嘴笨舌、疙里疙瘩；有的人说话阴声细气、温文尔雅，有的却声如洪钟、粗鲁鄙陋；有的人说话谦和谨慎、不苟言笑，有的则傲气凌人、轻薄放肆……以书面言语来说，每个人都是有区别的。鲁迅的文章以精辟简练著称，巴金的文笔则以流畅通达见长，朱自清的散文以清新雅淡而驰名华夏，柏杨的杂文则以讽喻谐趣而享誉环球……以人们思考时所使用的内部言语来说，也是人人有别的。内部言语，是人们在大脑中对语言的运用而已。既然每个人的外部言语是不同的，其内部言语自然也就不同了。

由于人们在运用共通的（即一般的）语言时是各自有别的，语言学家为了描述这种语言现象，提出了“言语”这个概念，把运用语言时各个人的语言表现称为言语。

由此可见，言语是个别人的语言表现。个别性，是言语的最重要特点。

至此，我们便不难看出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关系了。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关系，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中国的理论语言学用“一般与个别”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它们的地位：语言是一般，是一个供交际者采用的材料库，是一个具有民族特点的体系；言语是说话的行为和说话行为所产生的话语，说话的行为和说出的话语都是具体的、个别的，与言语发生关系的是说话的环境、内容和目的，或者说是交际的场合和话题。

一般性与个别性，同属一组哲学范畴。所谓一般性，亦即普遍性，亦即共性；所谓个别性，亦即特殊性，亦即个性。一般性寓于个别性之中，个别是一般的具体体现。它们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它们有条件地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能存在。即是说，每一方必须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语言这个一般性的事物，是存在于每一个运用语言的个别的（也是

具体的)人的言语之中的,如果没有个别的(具体的)人的言语,语言也就不复存在了;反过来,所有个别的(具体的)人的言语,尽管是各个有别的,但是,每个人的言语中都必须包含着语言的共通性(即一般性),如果不包含这种共通性(即一般性),则每个人说出来的话,相互间是不能通晓的,这就不成其为语言了,即是说,言语是对语言的应用。

二、静态与动态

语言与言语的相互依存,还可以从它们所处的存在方式来考察。语言有两种存在的方式:一种以备用的方式存在,等待着交际者使用但还没被采用;另一种方式是处于交际活动中,亦即处于正在被使用的状态。处于备用状态的语言如同美术家手中的线条和色彩,如同音乐家脑子里的音符与节奏;处于交际活动或正在被使用状态的语言,则好像美术家正在运用线条和色彩作画、音乐家正在用音符和节奏作曲。如果我们说正在被使用的语言是动态的语言,那么备用状态下的语言就是静态的语言。静态语言其实也是运动着的语言,因为语言永远处于变化与发展之中,绝对静止的语言是“死去”的语言,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所以我们只是“勉强”称备用状态的语言为静态语言。静态语言和动态语言各有不同的特色。为了区分两种状态下的语言的不同特色,我们称静态语言的特色为“特点”,而称动态语言的特色为“风格”。“特点”和“风格”在这里含有术语的性质。如果一定要使用“风格”这个词儿,我们就要区分“风格”用来描写静态语言的时候与“风格”用来说明动态语言的时候是有分别的。例如我们说不同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的风格,其实这里的“风格”是指语言的特点,语言的民族风格其实是语言的民族特点。同样,语言的时代风格其实是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特点。传统语言学对民族风格、时代风格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而语言在被人们使用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风格,则是现代风格学所要探索的主要课题。

三、特点与风格

将“特点”与“风格”这两个术语分开使用,是高名凯首创的。他不同意用“风格”一词指称备用状态下的语言特点。他说:“不能把语

言风格理解为与个别的语言有所不同的某一语言的特点。换言之，如果我们说汉语的风格，我们的意见只能指汉语在不同的交际场合中所形成的风格，而不能指汉语与俄语不同的特点，因为作为整个的语言来说，它可以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期中没有分化出不同的言语风格，然而它却随时都有它的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只有语言的特点，不能构成风格；要等到语言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在不同的交际场合中形成不同的气氛及其表达手段的系统的时候，才有风格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某些人把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的汉语的特点说成汉语的风格，是不恰当的。”^① 高名凯的意见无疑是特别强调在使用中（亦即在交际场合中）研究语言的风格。语言在被使用时表现出来的风格实际上就是“言语风格”。研究备用状态下的语言与研究使用状态中的语言是语言学的两个不尽相同的课题。前者以一种语言的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系统为研究对象，找出这种语言具有而那种语言不一定具备的语言成分或表达手段，由此显示出一种语言的特征。例如现代汉语音节结构单纯，没有复辅音（consonant cluster）；词汇以双音节为主，单音节的语素（morpheme）大多具有词汇意义；语法结构以词序（word order）为主要手段，较少形态变化（morphological change）等。这种研究所得，是语言的“民族风格”。后者是把一种语言放在具体的交际场合中，考察不同的交际场合具有哪些语言上的特点。这种考察，在中国古已有之，特别是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语言运用特别活跃的时期，然而未能发展为语言学中的一门专门学科。

四、语言与言语

语言与言语相区分的学说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首先提出来的。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② 的讲义中使用了一组与社会的、集体的语言（langue）相对立的术语——言语（parole）以及调整言语与语言相对立的“言语活动”（language），这就使后来的研究者能够在语言学中开拓一个新领域——言语风格的研究。

① 高名凯：《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见《语言学论丛》，第四辑，18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

② 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究。为了术语的统一，我们采用“语言风格”的术语，它的内涵实际上是语言在使用中表现出来的风格亦即“言语风格”。索绪尔不仅在理论上创建了语言与言语的学说，而且还因此扩大了语言学研究范围，把语言的运用也列入语言学研究范围。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还指出：“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风格学正是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他的高足法国语言学家巴利（Ch. Bally）接过他的理论大棒，在本世纪初出版了《风格论》（1905年）、《法语风格学概论》（1909年）、《语言与生活》（1913年）等专著，正式提出风格学的学说体系，力图阐发其业师的“言语”学说，但是终因理论张力薄弱，加之为当时的学术氛围所囿，这些著作所表述的思想被湮没在蓬勃兴起的“纯语言研究”的热浪之中。一直到50年代中期，苏联开展了一场“风格学大讨论”，这才冲开了纯语言研究的一统天下。

1953年至1955年之间苏联语言学家展开了一场语言风格和风格学的大讨论，提出的有代表性的问题有：风格的划分应以什么为标准？言语风格和言语体裁、言语形式有什么不同？文艺作品的言语风格、个人的言语风格是否也在风格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风格学是否可以分为语言学的风格学和文艺学的风格学？风格学是否可以分为功能的风格学和分析的风格学？风格和全民共同语有什么关系？风格和交际场合、交际目的有什么关系？构成风格有哪些要素？……总结这场讨论的是维诺格拉陀夫院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他的《风格学问题讨论的总结》指出了风格学的内容、对象和任务。^①这场大讨论标志着现代风格学全面正式地建立了起来。苏联风格学的建立给国际语言学界带来巨大的影响，汉语风格学就是直接在这一影响下建立起来的。

第二节 中国的风格学渊源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3000年前，中国的文明即已发展到了很高

^① 《语言风格与风格学论文选译》，141～179页。

的程度。发源于其他国家的语言学的许多学科例如语音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其实在古代中国早已萌芽，并对这些语言现象进行过非常细致的研究。例如中国古代“传”、“注”、“疏”一类著述，除了从内容方面诠释或发挥古籍之外，语言上的注解也是相当丰富的，这些注解开了汉语语音、语法、修辞等语言现象研究的先河，是古代中国语言学的宝贵遗产。言语风格的研究情况也是如此，只是古人对于风格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没有建立起风格学的理论框架。

一、孔子的风格观

孔子是十分重视言语的风格特征的。他一辈子履行“述而不作”的信条，没有留下风格学的煌煌大论，只是零零星星地发表了一些有关言语及风格等问题的议论。但这些零星议论的学术价值却是无法估计的。记述孔子待人接物的语录体著述《论语》，包含着他对言语及风格问题的精辟见解。

首先，孔子看到了言语的功能价值，将言语列为教育的一个科目。他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很明显，在孔子为升堂弟子开设的四个科目中，“言语”是与“德行”“政事”“文学”并重的。“德行”指品德的修养；“政事”指军事、民政、财务等行政事务；“文学”指经典以及传经的技术；“言语”科的设置则从辞令学方面去配合修养的完成，为学生将要从事的职业（从政、理财、出使、传经等）提供言语技能的训练。在孔子的时代，言语活动有很高的社会价值，掌握辞令技巧几乎是政治家、外交家们必须具备的条件。例如与孔子同时代齐国外交家晏婴，就曾不止一次地以机智的言语赢得外交斗争的胜利，维护了齐国的荣誉（事例参看《晏子春秋》）。孔子的“言语”科培养学生具备“可使与宾客言”的本领，最终目标则是使受过言语科训练的学生获得出使外邦完成应对使命的能力。

应对使命不易完成。言语不当，轻则失礼失态，重则人头落地，《左传》就有应对失当导致逃亡或杀身的记载。《襄公二十七年》“伯有将为戮矣”即是一例：郑伯（郑简公）宴请晋国使臣赵孟（赵武、赵文子）。席间赵孟请郑君的随臣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印段、公孙段七人赋诗助兴。六个人赋的诗都算得体，惟伯有赋《鹁之贲贲》

惹了麻烦。伯有本取诗中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的意思，然而《诗序》曾指《鹁之贲贲》为刺卫宣姜淫乱而作，所以赵孟当即表示“床第之言不逾阂，况在野乎？非使人（案赵孟自指）之所得闻也”。宴毕赵孟对叔向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更加预言“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依伯有的行为而论，五年之内必被杀也。

言语是对语言的运用。语言的好坏高低是相对的，言语却分优劣成败。能与某种特定的环境气氛相协调的言语才是优等的、成功的言语，因为它能促进交际任务的完成；否则，就是劣等的、失败的言语。现代风格学（stylistics）的根本原理，是语言的运用必须考虑交际内容和交际场合的特点，追求言语（包括言语活动与言语成品）同环境氛围的和谐，使语言的运用达到“得体”的境地，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效用。其实，这个现代风格学的观念早在《论语》中已经被提出。例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蹀蹀如也，与与如也。”（同上）《论语》的这些记述，既指出了不同类型的交际环境（于乡党；在宗庙朝廷；朝，与下大夫言；朝，与上大夫言；君在），又描绘了与不同交际环境相适应的言语格调（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便便言，唯谨尔；侃侃如也；闇闇如也；蹀蹀如也，与与如也）。《论语》有关言语气氛与交际环境相适应的议论，塑造了现代风格学的雏形。

风格学的理论原则是言语气氛须与交际环境相适应，风格学的学说体系大致包括风格的界定、风格的分类以及各类风格的不同语言特征。《论语》所缺乏的是如何借语言材料表现不同言语气氛的记载，但相信孔子是会有这方面的论述的，因为“言语”科一定会教给学生在不同的交际场合怎样运用不同的语言材料或语言手段去完成特定的交际任务。例如孔子一再教导他的儿子“何莫学夫诗”，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诗（《诗经》）的功能实在太大了，大到“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据朱自清统计，《左传》所记赋诗，见于今本《诗经》的，共58篇，引诗共84篇。这两项重见者均不计。再将这两项合计，再去其重复的，共有123篇。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他主张学诗是为了达政与专对，而

且学了就能用得上；如果用不上，学得再多也是毫无用处的。他要求学生学以致用，他自己在授课中必定会分析诗在达政与专对中的具体技巧。仍以引诗须配合交际环境与交际任务为例，《论语》的引诗就是最好的范例。它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比喻孔子修正子贡的言论；引“战战兢兢，如卧深渊，如履薄冰”形容曾子惊恐于疾病的心情；引“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证明“绘事后素”的道理，等等。同是引诗，伯有引来了杀身之祸，《论语》的引诗却帮助引诗的人传情达意，使言语发挥最大的效力。

“仁”和“礼”在孔子学说中是一对范畴，两者的关系是“里”与“表”的关系：“仁者爱人”，是内在的；“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孔子把言语现象纳入“礼”的范围之内，用“礼”来规范言语行为、衡量言语成品的优劣。例如置身于故土祠堂的“乡党”场合，面对族长乡贤，最不可浮夸虚诞，最宜于恭信肃穆，收敛言语，尽量做到“似不能言者”，这是“礼”的需要。而在威仪庄重的“宗庙朝廷”，谈吐则要“便便言，唯谨尔”，因为身处这种场合，既要严肃认真地讨论问题（便便言），又要小心谨慎地待人处事（唯谨尔），这也是“礼”的需要。由是观之，“约之以礼”是孔子对待言语的基本态度。

“慎言”与“巧言”是与“礼”有关的两种言语现象。孔子提倡慎言，反对巧言。提倡与反对都靠一个“礼”字作取舍。“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这是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来看慎言的重要。“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这是从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来谈慎言的意义。“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这是从行难言易上论证慎言的道理。“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这是从言与德的关系谈慎言。孔子甚至把“慎言”提到最高的道德层面来讨论：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

“仁”是“礼”的内涵，是人的修养的最高境界，在孔子学说中占有最崇高的地位。“言讱”与“仁者”并提，足见孔子对“慎言”的重

视。总之，孔子不单从形式方面谈语言技巧，而总是着眼于整个学说体系来考察言语及风格现象。

倡导慎言必然反对巧言。所谓巧言，是讨人喜欢的话，阿谀奉承的话，即是与“令色”、“足恭”同性质的言辞。孔子对巧言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一个“耻”字：“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耻”巧言，是因为它“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是因为它属于“道听而途说”（《论语·阳货》），是因为它“言不及义”（《论语·卫灵公》），是因为它“乱德”（《论语·卫灵公》）、“鲜矣仁”（《论语·学而》）。

“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论语·颜渊》），是从消极的或被动的方面规范言语行为；而透过言语行为解决“得人”与“失人”的问题，则是发挥言语的积极作用。孔子主张“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他能正确处理“失人”与“失言”的关系：“可与言而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孔子甚至婉转同意“一言可以兴邦”以及“一言而丧邦”的判断。

孔子对于言论问题有一个较全盘的构想。在语言运用的标准上，孔子提出著名的“辞达”论，即“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辞达论与慎言论是相联系的。孔子既然倡导慎言，那么在语言的运用上必然不尚富艳之工，只要做到“言以足志”就够了。辞达论的要义在于简洁通达，绝不意味言辞的贫乏。整部《论语》是辞达论的艺术范本，其中形象性、哲理性的语言数不胜数，给汉语宝库增添了不少闪光的珠玑。

孔子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因此提倡汉民族的共同语言，并且身体力行地作出示范。《论语·述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注》：“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何谓“正言”？钱穆《论语新解》注：“古西周人语称雅，故雅言又称正言，犹今称国语，或标准语。”杨伯峻《论语译注》干脆将“雅言”语译为“普通话”；全句语译为：“孔子有用普通话的时候，读《诗》、读《书》、行礼，都用普通话。”

《史记》描述孔子所处的时代特征时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当时，文化人

唯一能做的是运用语言从事政治的或外交的活动，宣传自己的治国主张，希望书生的抱负得以施展。因此，语言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孔子以一个思想家的深邃目光洞察当时的情势，发表了上述一系列切中要害的意见。因为切中要害，所以有用；因为有用，所以具有历史价值。这是一笔珍贵的古代语言学遗产，后来人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以便汲取它的有益养料，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风格学，充实与丰富现代的中国语言学。

二、孟子的风格观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其中当然包括孔子的有关言语和风格的理论。

孔孟哲学是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人生哲学指导人生修养，政治哲学则用于理乱治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礼”都是孔孟学说的一个重心（甚至有人认为“礼”是孔孟学说的“核心”）。按礼去修养，据礼以治国，修、齐、治、平都离不开礼。语言的使用无疑也受礼的规范限制。

“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论语·颜渊》），孔子以“礼”作为“听”和“言”的准绳。孟子思想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孟子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离娄下》，验之于言语行为，则非礼之言、非义之言当然都是“大人弗为”的了。

用哲学眼光看，“听”与“勿听”、“言”与“勿言”是一回事，“勿言”也是“言”，只不过是零形态的“言”罢了。“言”受“礼”的支配，“勿言”同样也受“礼”的支配。《孟子》不少章节描述“勿言”的情景。

不妨考核一下孟子对盖大夫王骀的态度：“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按即盖大夫王骀）往弔。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骀言，孟子独不与骀言，是简骀也。’孟子闻之，曰：‘礼，朝臣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按王骀字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孟子·离娄下》）文中孟子不与骀言，所依的是“礼”。孟子不仅“不历位而相与言”，而且也“不逾阶而相揖”，足见不依礼的“言”、“行”都是孟子所不为的。